



浅论杜牧诗文中的军事思想与《孙子兵法》

杨 辉

摘 要：晚唐社会，藩镇割据，边防虚弱。杜牧继承了祖父杜佑作《通典》经世致用的家学传统，又结合唐代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用兵建议。他的军事思想在其诗文中也有所体现。杜牧的论兵建议以及在其诗文中所体现的军事思想与《孙子兵法》有密切的关系。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证：一、杜牧论政言兵的缘起；二、杜牧诗文中的军事思想与《孙子兵法》。

关键词：杜牧诗文 军事思想 《孙子兵法》

一、杜牧论政言兵的缘起

杜牧，字牧之，晚唐杰出诗人，兼长古文。他所出生的时代，正是晚唐多事之秋。藩镇跋扈，外族侵袭。而杜牧素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经邦济世的抱负，关心政治，喜欢论

史，尤谈兵，精辟中肯。不愧是中国古代一位卓越的军事理论家。

（一）危机四伏的晚唐社会

“安史之乱”以后，唐朝由所谓“太平盛世”而陷入内

竹含新粉，红莲落故衣”。（《山居即事》）用清新含蓄而饶有韵致的笔调，写出了自然景物的细微变化和音响。王维的诗往往以声息为宁静服务，以声写静，更能逗起人的思维，使人感到静意。例如《过香积寺》：

不知香积寺，数里入云峰。古木无人径，深山何处钟。泉声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薄暮空潭曲，安禅制毒龙。

在古木参天、杳无人迹的云雾山中，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古寺钟声，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，给山林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山泉低沉呜咽，阳光透出寒意，深山的一切景物都是那么清冷荒僻，独行山中，甚至会给人以孤独无依之感。但作者安然自得，随处游赏，将近黄昏时，在空旷深潭的曲岸摒弃杂念，静坐参禅。全诗通过山中景物的描写，造成一种深邃幽远的氛围，表现了作者超然物外的心境。

王维在运用声响与诗歌相结合的同时，人的参与使诗歌中充满了活泼的气氛，例如《山居秋暝》：

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

这是王维隐居辋川时早期的作品，黄昏的美景却如在目前，反映了作者的审美意趣。诗人本不执着，任情去留，无可无不可，因此作者所见的一切景物都是那么清新可喜。“明月松间照”二句，描写出山林的静谧。“竹喧归浣女”二句，则渲染出活泼的气氛，有动有静，动静相间，但不论是动还是静，都那么自然生动而韵味深长。全篇风格明快自然，富于生活气息，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。

此外，王维善于将声响与禅意巧妙结合起来表现动静的和谐美。如《鸟鸣涧》：

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

这首诗作者极度写静谧的山中，只有桂花纷纷落地，由于太静了，月亮出来竟然惊动了山鸟，于是空谷中断续有几声鸟鸣。这瞬间的动态又生出无限的静感。正如皎然所说：“静，非如松风不动，林狖未鸣，乃谓意中之静。”王维参禅悟到妙处曾说“一悟寂为乐，此生闲有余。”（《饭覆釜山僧》）他的诗中多是借助声息与禅意相融化，将诗中的动、静和谐的统一起来。

注释：

[1] 王夫之：《唐诗评选》，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7年1月版，第186页。

[2] 王从仁，葛杰撰：《王维、孟浩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1月版，第78页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詹锬：《唐诗[M]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。

[2] 陈贻焮：《唐诗论丛[M]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0。

[3] 林庚：《唐诗综论[M]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7。

[4] 王明居：《唐诗风格美新探[M]》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87。

[5] 陈铁民：《王维、孟浩然诗选[M]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5。

（何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）



忧外患之中。庄田制发展，土地大量集中，征敛加繁，民生益窘；而藩镇跋扈，宦官专权，朋党倾轧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，错综复杂。这些都直接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痛苦，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，而国外的吐蕃、南诏、回鹘又纷纷侵扰。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。

当时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藩镇跋扈与外族侵袭。安史乱后数十年间，藩镇割据，内战频繁，当时朝廷安于苟且，河北藩镇称霸一方，不服中央政令，河南藩镇，起而效尤，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。朝廷虽用兵讨伐，而力量已弱，常中途妥协，更失威信。同时，自安史乱起，唐朝将陇右、河西、朔方诸镇的精兵都调去平乱，所留下的兵大多单弱，因此边防空虚，而吐蕃统治者乘唐朝衰弱不断东进，占据河西、陇右，威胁京都，河陇人民长期受吐蕃奴隶主奴役。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，才能使国家安宁，生产发展，人民康乐，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，都必须用兵。当时唐朝内政产生了毒瘤，就是宦官专权。代宗命宦官鱼朝恩总领禁兵，又开宦官干涉军权之端。德宗初年，泾原兵在长安作乱，乱平之后，德宗不愿意武臣掌握重兵，从此宦官权势更大。所以，杜牧很注重兵事，认为士大夫不知兵是不对的。

（二）经邦济世的宏伟夙愿

杜牧自幼受过良好、严格的教育，喜欢读书，关心时政。十五六岁就立下宏愿，要成为国家栋梁之材，立志使危机四伏的晚唐社会重振雄风。他继承了祖父杜佑作《通典》的经世致用之学，很注重研究“治乱兴亡之迹，财赋兵家之事，地形之险易远近，古人之长短得失”^[1]，有忧国忧民的热情与经邦济世的抱负，最喜论政言兵。《唐才子传》卷六说：“牧刚直有奇节，不为龌龊小谨，敢论列大事，指陈利病。尤切兵法戎机，平昔尽意。”^[2]

杜牧看到宪宗连年用兵讨伐藩镇，感到用兵的必要；而吐蕃统治者占据河西、陇右，河陇人民也长期受吐蕃奴隶主奴役之苦。所以他非常注重兵事。后博读经史，更深信兵事关系国家兴亡。又根据《礼记》：“四郊多垒，此卿大夫之辱也”，认为士大夫应当知兵，而当时士大夫对于兵事漠不关心，完全仰赖健善击刺之徒。杜牧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，从此注意兵法，后来一直研究。他在《注孙子序》中说：“及年二十，始读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十三代史书，见其树立其国，灭亡其国，未始不由兵也。”“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，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，苟有败灭，真卿大夫之辱。”

杜牧一生的崇高理想是“平生五色线，愿补舜衣裳”（《郡斋独酌》），所以始终主张削平藩镇，加强统一，收复河湟，巩固边防，其最终目的是：“生人但眠食，寿域富农桑”（《郡斋独酌》），使人民能安居乐业，生产得以发展。要实现这些，就必须研究兵法。正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

志》卷三“杜牧注孙子”条中说：“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，欲试而不得，其学能道春秋、战国时事，甚博而详，知兵者将有取焉。”可见杜牧颇负经天纬地之才。

二、杜牧诗文中的军事思想与《孙子兵法》

清亮吉《北江诗话》评杜牧：“文不同韩柳，诗不同元白，复能四家之外，诗文皆别成一家。”^[3]他平素关心政治，喜爱论史谈兵，这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体现。诗歌中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《赤壁》、《题乌江亭》等诗篇里，而散文中的《罪言》、《战论》、《守论》、《原十六卫》等则是以军事理论家的眼光，谈古论今，气势不凡。

（一）杜牧诗歌中的军事思想

《赤壁》一诗一反历代史家认为周瑜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“公论”，这首诗认为周瑜的胜利几乎是侥幸的。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，只是老天相助，乱起东风，才取得胜利。这儿虽然有“天者，阴阳、寒暑，时制也”，“知之者胜”（《计篇第一》）的道理，但杜牧更多的是强调将帅内在的素质，即“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”（《计篇第一》）。作为将帅应该凭借足智多谋、言而有信，仁爱部下，勇敢果断，治军严明等素质和能力去争取胜利，而不应依赖偶然因素取得胜利，否则便不能算作英明的将帅。周瑜占据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合等有利条件，当然能够得胜，这些都是外部条件，而杜牧则强调战争胜负更着眼于内部因素，作为将帅更应把握战争的普遍规律，不能用一次胜败论英雄，真正的英雄应战无不胜。《题乌江亭》一诗也一反常人肯定项羽自刎，而说“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。究其意是说战争的胜负常常出乎兵家意料，项羽不能含羞忍耻，卷土重来，因此失败。作为将帅应该能屈能伸，“包羞忍耻”，要有长远大计，以大局为重，要考虑到战争的性质是代表整个集体利益，不能因一时失败而一蹶不振，不能感情用事，否则就会招致覆军杀将的厄运。这包含了“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，杂于利而务可信也”（《九变篇第八》）的思想。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，必定兼顾利害两个方面，在不利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到有利的因素，战事就可以顺利进行。将帅最忌“必死，可杀也”，“忿速，可侮也”。（《九变篇第八》）只知道死拼硬打就可能被诱杀；性情暴烈，急躁易怒，就有可能被敌人的侮辱激而中计。这是将帅的过错，也是用兵的灾难。回顾历史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大将韩信曾受胯下之辱，他们最终都成为英雄。所以，英明的将帅要能“包羞忍耻”，以大局为重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。

《感怀诗一首》揭示了安史之乱后，藩镇联合对抗朝廷的史实。当时，迫切需要英明的将帅的出现，所以作者感慨“韩彭不再生，英卫皆为鬼”，称赞“伍旅拔雄儿，梦卜庸真相。”这其实揭示了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君主政治清明，唯



才是举；将帅应有才能。正如《孙子兵法计篇第一》上所说：“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……吾以此知胜负矣。”这种思想在以下两首诗中也有所揭示。

《郡斋独酌》里说“我爱李侍中（李光颜），飘飘七尺强。白羽八札弓，彤压绿檀枪。”“我曰天子圣，晋公提纪纲”，“仁圣天子寿天疆。”《雪中书怀》里说“人才自朽下，弃去亦其宜”。以调侃的语气，揭示了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君主昏庸，将才之士不能重用。说明了英明君主，有才能的将帅在作战中的重要性。此外，还有些咏史诗篇也包含了一些军事思想。

总之，杜牧诗歌中流露出的军事思想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。

（二）杜牧散文中的军事思想

杜牧的军事思想不仅在其诗歌中流露出来，更主要地是在其散文中也有直接论述。《罪言》、《战论》、《守论》、《原十六卫》等军事著作，都是中国古代兵书要籍。

对付藩镇，杜牧在《罪言》一文指出太行山以东、黄河以北，这一带自古重要，“王者不得，不可以王，霸者不得，不可以霸。”^[4]但自天宝末，安史之乱起，河北百余城，朝廷不得其尺寸，人望之若回鹘，吐蕃，无敢窥者。黄河以南也受其影响，“未尝五年间不战，生人日顿委，四夷日猖獗。”^[4]今上策莫如自治，朝廷应检查：自元和以来“法令制度，品式条章，果自治乎？……如不果自治，是助虏为虐。”^[4]中策莫如取魏，因为魏地形势重要，“常操燕、赵之性命”^[4]。最下策是浪战，“不计地势、不审攻守是也”^[4]。杜牧主张削平藩镇，加强统一，但并不专门强调用兵，而认为最好是朝廷能检查自己政治上的缺点，加以改革，其次才是讲求用兵的策略。地理条件对战争的胜败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，“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制胜，计险厄运近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，必胜。不知此而用战者，必败。”（《地形篇第十》）杜牧在《罪言》一文里强调的是“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”（《计篇第一》），也就是朝廷应修明政治，使人民与君主同心同德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，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”，“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”（《谋攻篇第三》）。由此可见，《罪言》一文所揭示的用兵思想与《孙子兵法》有密切关系。

《原十六论》、《战论》、《守论》也都是结合唐代形势发抒他论兵的思想。《原十六卫》认为府兵制是很好的制度，“本原事迹，其实天下之大命也。”“缘部之兵，受命于朝……以首争首，以力争力”，“自贞观至于开元末百三十年间，戎臣兵伍，未始逆篡，此圣人所能柄统轻重，制障表里，圣算神术也。”至开元末，“府兵内削，边兵外作，戎臣兵伍，湍奔矢往。”于是“根萌烬燃，七圣旰食”。国

家之兵居外则叛，居内则篡，这是说在军队编制、军事训练、管理教育、法令法规等方面应对藩镇进行加强管理。

《战论》分析了河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。“河北视天下，犹珠玑也，天下视河北，犹四支也。珠玑苟无，岂不活身，四支苟去，吾不知其为人。”又进一步指出唐用兵讨代藩镇有五种错误：一是不搜练，二是不责实料食，三是厚赏，四是轻罚，五是不专任责成。由此可见，战争的胜负，地理位置是关键，河北为“争地”，对“争地”“应先夺其所爱，则听也。”（《九地篇第十一》）谁先控制河北，谁就掌握了主动权，同时还要求军纪严明，法令严格，训练有素，军队管理加强，赏罚分明。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。正如《孙子兵法计篇第一》上所说：“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，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”

《守论》一文则揭发大历、贞元时期，朝廷姑息藩镇之弊。“国家不议诛洗，束兵自守……而行始息之政，是使逆辈益横，终倡患祸。”“干戈朽，铁钺钝。”而执事大人，曾不历算周思，以为宿谋，“不图擒取，而乃偷处恬逸”，“破制削法”。所以文章最后，作者呼吁“大历贞元守邦之术，永戒之哉”。杜牧历来主张削平藩镇，不能姑息养奸。正如《孙子兵法》上所说：“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”（《谋攻篇第三》），“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。”（《形篇第四》）要想战胜敌人，则应该采取进攻。“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……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”（《形篇第四》）

所以，《守论》一文告诉我们，在作战时只有把握进攻主动权，才能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，“因敌而制胜”（《虚实篇》）。

此外，杜牧的军事思想还体现在其它的军事论文中，这些都足以证明他的政治上的远见，军事上的才能。

注释：

[1] 《樊川文集》卷十二《上李中丞书》。

[2] [元] 辛文房撰：《唐才子传》，舒宝璋校注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第285页。

[3] 谭家健：《中国古代散文史稿》，重庆出版社，2006年版。

[4] 吴在庆撰：《杜牧诗文选评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缪钺著．杜牧传[M]．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．

[2] 吴在庆撰．杜牧诗文选评[M]．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．

[3] [唐] 杜牧著．樊川诗集注[M]．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．

[4] 孙武著．孙子兵法[M]．马一夫译评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9．